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 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GAI GE KAI FANG YI LAI DANG DE
NONG CUN JIAN SHE DE
LI LUN YU SHI JIAN

刘 斌 刘家桂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 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GAI GE KAI FANG YI LAI DANG DE
NONG CUN JIAN SHE DE
LI LUN YU SHI JIAN

刘 斌 刘家桂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刘斌,刘家桂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06-06172-1

I.改… II.①刘…②刘… III.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689 号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著 者:刘斌 刘家桂

责任编辑:隋 军 封面设计:丁 雪 责任校对:赵洪涛

咨询电话:0431-85378017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太平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5 字 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6172-1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总人口达 13 亿，其中 80% 是农民，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对我国来说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到我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它关系到我国内需增长战略的实现，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农村不发展，也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发展。要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搞好农村建设。农村建设问题在国家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与未来。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阶段。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它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转型是艰难而又痛苦的。作为农业人口大国的中国，这种转型显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因此，其挑战也特别严峻。其中，农村问题是这一转型中最复杂也最为关键的因素。温铁军先生曾直截了当地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称为“农村问题”。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农村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更加密切，农村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深远而巨大。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要将农村问题作为我国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并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国家决策。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为标志，我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温故而知新，知古而鉴今。在这一大变迁的十字路口，对我国农村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政策、实践及其相关的主要理论和经验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显得尤为必要。本书正是基于“知古而鉴今”的美好愿望，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以时间为线索，以党的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建设的主要政策、措施（如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民利益保护、农村保障制度建设、发展模式）和主要理论（如农村理论、农村建设观）的主要历程和经验进行了描述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展望。

除前言和附录之外，全书内容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描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历程。将党的农村建设分为农业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953年）、农业集体化改造时期（1953年~1956年）、“大跃进”到两年徘徊时期（1956年~1978年）、改革初期（1978年~1984年）、深化改革中的全面探索时期（1985年~2002年），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2003年至今）几个阶段。第二章，是时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经验总结。本章首先对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主要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然后在对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确立与变迁进行梳理的同时，对党的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第三章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在本章中，作者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划分为乡、村政权并存时期（1949~1953年）、乡政权时期（1954~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4年）和“乡政村治”（1985年至今）等四个时期，对不同时期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归纳、梳理，分析了“乡政村治”时期农村治理存在的复杂局面，指出了后税费时代农村治理的变革与创新方向和途径。第四章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与发展。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始终是党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关心农民利益，把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当做自身的重要使命，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创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打敌人，搞生产，不断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土地改革，维护了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一最根本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下放生产经营权，加大支农投入和制定支农惠农法规，农民利益得到了有史以来最有效的维护与发展。第五章，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本章中，作者首先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分析，然后对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历程进行了回顾，并通过对比，指出了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原则和政策、措施。第六章，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商贸型发展模式、小城镇型发展模式、工业企业型发展模式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务输出型发展模式、旅游观光型发展模式、特色农业型发展模式等几种典型农村建设发展模式进行了评述。第七章，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理论与农村建设观。本章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农村建设观的内容与背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经验。第八章，分析了21世纪我国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

出了21世纪我国农村建设的方向和对策建议。21世纪,我国农村建设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农业资源匮乏,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二是国际竞争加剧、农业发展压力增大;三是农民收入增长钝化,农业自我发展能力缺失。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21世纪,我国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中心,走农村生态化、农业产业化的特色发展模式之路。在具体实践中,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业保护体系,优化农村制度环境,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突破农村经济结构制约。

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农村建设具有特别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这份财富,弥足珍贵。

刘 斌 刘家桂

2009年元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历程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党对农村建设的探索	(1)
一、农业经济恢复时期	(1)
二、农业集体化改造时期	(3)
三、“大跃进”到两年徘徊时期	(7)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党对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探索	(12)
一、改革初期的探索	(12)
二、深化改革中的全面探索	(15)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	(29)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经验总结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土地制度	(33)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土地政策	(33)
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土地政策	(39)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	(46)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制度	(51)
一、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三次尝试	(51)
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的确立	(55)
第三节 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61)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第一节 从乡、村政权并存到“乡政村治”	(65)
一、乡、村政权并存时期	(66)
二、乡政权时期	(66)
三、人民公社时期	(67)
第二节 “乡政村治”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	(69)
一、撤社建乡	(69)

二、村民自治	(71)
三、乡镇政务公开	(76)
第三节 “乡政村治”时期的农村治理	(77)
一、“乡政村治”时期的农村两委权力结构	(77)
二、“乡政村治”时期农村治理的复杂局面	(81)
三、后税费时代农村治理的变革与创新	(85)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与发展	
第一节 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始终是党的“重中之重”	(91)
一、推进土地改革,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	(91)
二、过渡时期党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92)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与发展	(95)
一、农民利益与党启动工业化的两难选择	(95)
二、下放生产经营权,维护农民利益	(99)
三、农民利益保护的制度化、法制化	(102)
第三节 新时期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的对策建议	(106)
一、加大支农投入	(106)
二、完善支农政策	(107)
三、完善支农惠农的法律法规	(109)
四、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113)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节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基础	(116)
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历程	(119)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19)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121)
第三节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措施	(127)
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	(127)
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目标	(130)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	(131)
四、建立健全农村保障体系的措施	(132)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几种典型农村建设发展模式评述	
第一节 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发展模式评述	(137)
一、商贸型发展模式	(137)
二、小城镇型发展模式	(139)

三、工业企业型发展模式	(141)
第二节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模式评述	(144)
一、劳务输出型发展模式	(144)
二、旅游观光型发展模式	(147)
三、特色农业型发展模式	(149)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理论与农村建设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农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51)
一、中国共产党农村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151)
二、中国共产党农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154)
第二节 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农村建设观	(156)
一、“为战争服务”的农村建设观	(156)
二、“为城市、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服务”的农村建设观	(158)
三、“为农民服务”的农村建设观	(160)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经验	(162)
第八章 21 世纪中国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	(169)
一、农业资源匮乏，农村生态环境恶化	(169)
二、国际竞争加剧，我国农业发展压力增大	(171)
三、农民收入增长钝化，农业自我发展能力缺失	(171)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农村建设的方向	(173)
一、坚持农业清洁生产与农村生态化发展之路	(173)
二、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走农业产业化之路	(174)
三、坚持因地制宜，走特色发展模式之路	(176)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农村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178)
一、完善农业保护体系	(178)
二、优化农村制度环境，实行制度创新	(180)
三、调整产业结构，突破农村经济结构制约	(185)
后 记	(187)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农村建设的主要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就逐渐认识到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非执政党，虽未掌握足够的政治资源，推动我国农村建设事业，但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的尝试。在土地所有制改革、农村政权建设、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为日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农村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实，这些理论和实践就是党的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以及列宁的“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刚刚主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把农村的工作重心由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权建设转移到通过集体化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以改造小农经济的轨道上来。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党对农村建设的探索 (1949年~1978年)

一、农业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953年）

建国后前3年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生产力水平低下，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

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新中国在财政经济等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党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年冬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了土改运动。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和房屋等，还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贯彻和执行了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地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①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摧毁，地主阶级也被消灭。土

^① 周占杰.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D]. 郑州: 河南大学, 2007. 8.

地改革的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也确保了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业生产和农村生产力都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变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个人所有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15.3%。^①

二、农业集体化改造时期（1953年～1956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变农业大国为工业大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完成我国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前提和必备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又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成为第一要务。但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落后、分散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经过3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党中央经过近一年的酝酿，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宣传总路线，党中央于1953年12月28日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两次修改、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

早在建国前党就有了引导农民走合作经济道路的思想。1948年4月15日，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拟定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他认为，农民首先是劳动者，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同时因其私有性、无组织性、散漫性等弱点，须引导农民走合作经营道路。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进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18.

行,农村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新问题。1951年底,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土改后的农民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现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要求不能忽视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互助合作要按自愿互利的原则进行。农业合作化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

但在关于农业改造速度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争议。毛泽东明确主张巩固合作社,认为确保私人财产,搞“四大自由”(土地租佃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更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认为邓子恢等走的是富农路线,“好行小惠”。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厂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厂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式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①刘少奇则认为,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互助组织还不具备向农业集体化过渡的条件,“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②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③他主张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织。

从1952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苏联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现代化发展战略。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顺利发展,中央在1953年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急躁冒进的倾向。1953年2月,针对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对农民干涉过多、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中央发出指示,纠正互助合作中急躁冒进的倾向。但是,1954年3月前后毛泽东几次对邓子恢等人的批评又助长了这种冒进。1955年3月,合作社一哄而起,但一些地方出现了社员退社、大批出卖、宰杀牲口等现象。毛泽东采纳了邓子恢等人稳步推进合作社的建议,并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但是,同年4月,毛泽东从南方视察农村后回京又作出了新的判断: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合作化还可以再快一些。主张修改春季所作的计划,认为农业合作社到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7~198.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18.

③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31.

1956 春年可以发展到 130 万个，即翻一番。邓子恢则认为合作社发展已经很快，存在问题很多，应巩固现有的合作社。毛泽东在 1955 年 7 月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时，对邓子恢等人所谓的“右倾”进行了批评：“我们有些同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甚至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①在此政治氛围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超高速发展。到 1956 年底，全国有 96% 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 87%。原计划 18 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 11 年完成。^②

以“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实质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解决所有制问题，扩大国有制，新建、改建、扩建国营企业；将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两种私人所有制，经过公私合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企业，以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其中，“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化”和“改”，都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规定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这是考虑到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改造亿万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当时估计，需要 3 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时间，加上 3 年恢复时期，共 18 年。这是较为稳重的估计。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实际执行时，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 15 年或 20 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进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原来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相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过渡的步骤、方式、方法等方面作了相当大的改变：（1）改变了民主革命胜利后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然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提出可以根据新民主主义建设面临的矛盾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2）改变了民主革命胜利后集中力量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

①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18, 436.

②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16.

社会主义改造要同时并举。(3)改变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先利用、限制,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待条件成熟时通过国有化法令将其收归国有的设想,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可以同时进行的方针,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其逐步引上社会主义轨道。(4)改变了必须先有工业化,在工业能为农业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情况下才可以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设想,提出在很少甚至没有农业机械的情况下,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等形式,也可以实现农业集体化,可以先集体化,后机械化。

毛泽东原来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在新中国成立3年后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实现国家工业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改造。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会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矛盾和冲突。另外,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也与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大量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资金产生了矛盾。第二,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可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没收官僚资本,使旧中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客观上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第三,找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逐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即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以互助合作的形式改造农业和手工业。第四,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从当时两大阵营的发展情况看,资本主义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则充满活力,这使毛泽东考虑尽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过于急促和粗糙,遗留下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党和人民作巨大的努力,甚至还会有原来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艰难和曲折,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党领导土改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标志着中国农村不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

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①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大跃进”到两年徘徊期（1956年～1978年）

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要求通过更多发展农业、轻工业来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架，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许多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说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② 最终走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究其本质，实际上是个“穷过渡”，即在生产力还未达到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建立人民公社，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去。“大跃进”的提出很重要的原因是由1957年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后期发生“反右”扩大化引起的。党内的这次整风运动，从当时来看是完全必要的，通过整风可以纯洁党的肌体，统一党的思想和行动。但是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党对这股逆流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然后，“反右”的胜利又使党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保守的。此外，又因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给了我们极大鼓舞。

1958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

^①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18.

^②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76.

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亿千克增加到3000亿千克~3500亿千克。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见庐山会议）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高指标为特征的“二五”计划促使工农业走上了“大跃进”的道路，伴随着“大跃进”，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农村很快兴起。

关于在我国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